

蔡天新发明的“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之说纯属自欺欺人

刘合国

(海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 2012年蔡天新发明了南宋杰出数学家秦九韶修建杭州西溪桥、元代杰出数学家朱世杰将西溪桥改名道古桥的惊人之说,此后他还在多种公开场所传播这个发明。“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之说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广泛影响,也已经被许多不明真相的读者广泛采信。按照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本文利用《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梦粱录》《本草纲目拾遗》《乾隆杭州府志》《民国杭州府志》《杭州市地名志》等权威史料严密考证得到两个明确结论。其一,现有的杭州道古桥的前身就是南宋修建的道姑桥,道姑桥的修建与秦九韶毫无关联;其二,道姑桥之名至少沿用了643年,即从咸淳九年(1273年)至民国五年(1916年),道姑桥更名道古桥肯定是在民国五年之后才发生的事情。这样道姑桥以及道古桥就与秦九韶、朱世杰毫无关联,“秦九韶修建西溪桥、朱世杰将西溪桥改名道古桥”纯粹是一个子虚乌有的随意演绎之说。

关键词 秦九韶; 道姑桥; 道古桥; 咸淳临安志; 民国杭州府志

中图分类号 I209

秦九韶(1208年-1268年或1269年,按照[1]),字道古,南宋杰出的数学家。他撰写了我国数学史上垂示不朽的伟大著作《数书九章》, U. Libbrecht撰写的专著《Chinese Mathematics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和吴文俊主编的文集《中国古代数学家秦九韶与〈数书九章〉研究》从多个视角诠释了这部名著已经产生的深刻影响。就历史研究而言,前人早已穷尽了秦九韶本来就所剩无几的史料,今人要再发现尚未问世之珍稀史料的机会微乎其微。出人意外地,2012年坊间突然爆出一条惊人新闻:秦九韶建造了杭州道古桥。

一、两处硬伤

2012年4月28日《浙江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西湖新添‘道古桥’景点”的新闻报道,照录全文如下:

“五一”小长假将至,杭州黄龙商务区天目山路北侧沿山河畔,“道古桥”的复名立碑为杭城增添一处不可多得的科学人文景观。这是体现杭城历史与发展的缩影符号,是一种文化传承。今天上午10时,在道古桥新址,浙大的唐孝威院士、林正炎教授等和杭州市民政局、地名办、西湖区和灵隐街道有关方面负责

人参加了“道古桥”揭碑仪式。

此桥由浙大教授蔡天新提议命名，桥名由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王元先生题写，碑文记载了道古桥的历史。道古桥由南宋大数学家、闻名中外的中国剩余定理发现者秦九韶亲自设计。

原桥址及河段已在2000年填拆，仅留道古桥公交车站，新桥建于2005年，两桥相距不足百米。秦九韶是四川人，在浙江生活多年，在湖州完成巨著《数书九章》，被美国科学史家萨顿称赞为“他那个民族、他那个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2012年4月29日《中国新闻网》以“西湖新增道古桥景观 设计者为南宋数学家秦九韶”为题进行了跟进报道。从这种阵仗来看，秦九韶造桥之说肯定是确凿无疑了。如果这则新闻是真实的，那蔡天新确实为中华典籍增添了又一个优美的掌故，善莫大焉。

现在杭州道古桥专门立有石碑，石碑正面镌刻着王元题写的碑名“道古桥”，背面刻上了说明文字：

道古桥，南宋嘉熙年间建。造桥人数学家秦九韶，字道古，著有《数书九章》，含闻名中外的中国剩余定理。原桥由秦九韶设计建造（西溪桥），元代数学家朱世杰命名（道古桥）。新千年之初，因西溪路扩建被夷，留同名公交车站（道古桥站），离此约百米。新桥建于2005年，桥名由数学家王元院士题写。

西湖区人民政府

2012年4月

2013年徐雯雯和俞宁就“道古桥”揭碑仪式之事在《数学文化》发表文章“跨越千年的数学桥”[2]，它完全是一篇应景之作，图文并茂，极具爆炸性，声称“当地居民对这座石桥的历史几乎无人知晓，直到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蔡天新揭开了这一段尘封的记忆”。非常引人注目的是，该文很例外地用中、英两种文字对照撰写，其英文文字发表在《Notices of the AMS》，题目为“Bridge Named After the Mathematician Who Discovered the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这篇英文文章（即文献[3]）随后非常及时非常醒目地出现在《数学传奇》之“再版序言”里：

部分篇目被译成五六种文字，先后发表在《美国数学学会会刊》（Notices of Amer. Math. Soc.）等世界各国的报刊上。

蔡天新的操作有如行云流水，衔接处无丝无缝，令人叹为观止。

2012年5月，蔡天新草就一篇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奇文章“秦九韶，道古桥与《数书九章》”，2013年8月修改完毕，文章收录在《数学传奇：那些难以企及的人物》[4]之乙辑。这篇文章共分五节，第一节“道古新桥”确实发前

人之未发，摘录文中的三处新论如下：

南宋咸淳初年《临安志》有载：“‘西溪桥’，本府试院东，宋代嘉熙年间道古建造。”这个造桥的道古不是别人，正是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道古是他的字。

1238年，秦九韶回临安丁父忧，见河上无桥，两岸人民往来很不便，便亲自设计，再通过朋友从府库得到银两资助，在西溪河上造了一座桥。

桥建好后，原本没有名字，因桥建在西溪河上，习惯上被叫作“西溪桥”。直到元代初年，另一位大数学家、游历四方的北方人朱世杰（1249-1314）来到杭州，才倡议更名为“道古桥”，以纪念造桥人、他所敬仰的前辈数学家秦九韶，并亲自将桥名书镌桥头。

蔡天新的这个发明堪称石破天惊！

非常明显，蔡天新的发明建立在他引用的史料“西溪桥 本府试院东，宋代嘉熙年间道古建造”的基础之上。抛开这篇奇文的后四节不论，本文只关注第一节的上面三段引文，第一段引文初看起来就存在两处显而易见的常识性硬伤，这种硬伤足以说明蔡天新依靠的史料来路不明，根本不值得采信，随之他的发明也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一，宋代修撰的志书绝不会自称所处的时代或朝代为“宋代”，这类似于今人绝不会称现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一样。一旦称“宋代”，也就意味着写这句话时，“宋”已经是前朝了。即便在当时需要点明“宋”这一国号，也会采用“国朝”“本朝”或“圣宋”“皇宋”之类的称呼。《咸淳临安志》[5]乃潜说友（1216年-1288年）知临安府时撰修，是十足的官修志书。潜说友出身进士，修志时地位尊崇，绝不可能在所修志书里出现“宋代”二字。现在即使翻遍《咸淳临安志》，也绝对找不到“宋代”一词。此外，要是潜说友真要记载秦九韶修建了所谓的西溪桥，于情于理于文法他都不会略去秦九韶的姓“秦”，仅用“道古”来指代秦九韶。仅凭以上简析就能够快速地做出基本判断：“宋代嘉熙年间道古建造”绝对不是《咸淳临安志》里的话。

其二，世上根本不存在“南宋咸淳初年《临安志》”。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十月，南宋第五位皇帝宋理宗赵昀卒，遗诏太子赵禔即皇帝位，这年赵禔沿用景定年号，次年改元“咸淳”，直至咸淳十年七月癸未日赵禔卒于临安宫中。年号“咸淳”一共用了10年，从1265年至1274年。潜说友在咸淳四年（1268年）兼知临安军府事；五年，升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军府事；六年，以中奉大夫权户部尚书兼知临安军府事；九年，因惩办太师、平章军国重事贾似道的管家被罢去临安知府。潜说友在任内修纂《咸淳临安志》一百卷，是志在时间上的最后一条记载出现在卷之四十九《秩官志七》，云：

今上皇帝（咸淳）九年（癸酉），五月三日免兼。

朱浚 建宁府人，是月四日，以朝散郎、直秘阁、权发遣两浙路转运判官，时暂兼权，候有正官，仍旧。

黄万石 建昌军人 是日以显文阁直学士、朝奉大夫召赴行在，除权户部尚书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兼敕令所详定官。

由此可以断言《咸淳临安志》成书必然在咸淳九年（1273年）五月之后。注意到元军在德祐二年（1276年）攻陷临安，南宋在1279年完全覆灭，且朱士嘉《临安三志考》已经确证了存在7种宋刊本《咸淳临安志》，于此可见在1273年至1279年之间已经出现了多个版本的《咸淳临安志》，南宋文化确实高度繁荣。《咸淳临安志》的成书时间充分表明蔡天新大概率不了解该志的最基本信息，其“咸淳初年《临安志》”之说必然归于信口开河之类。

蔡天新发明“秦九韶造桥”这个惊天传说后，就在公开场合努力宣扬他的发明，并强化他守护“道古桥”的形象。久而久之估计他自己都信以为真了，再也不会反思他的发明本身就是空中楼阁，他把自信、自是、自用、自恋以及自欺欺人发挥到了极致，这在数学界几乎是闻所未闻的。

2014年8月22日《文汇报》在《文汇报·焦点》版刊发一篇文章，标题令人啧啧称奇：诗人讲“数学传奇”，门外汉都听得有滋有味。文章写道：

守护“道古桥”

听过蔡天新讲课的学生，都会记住“秦九韶”这位南宋大数学家的名字，有人甚至还会专门去杭州天目山路上的道古桥去“朝圣”。小巧精致的道古桥，是秦九韶亲自设计的，“道古”两字正是秦九韶的字号。

到了当代，蔡天新却成了秦九韶的另一个“守护者”。原来，进入本世纪后，架在杭州西溪河上的道古桥难逃拆迁命运，当地的一项市政建设工程上马，导致桥毁河填，只保留了道古桥公交车站的名称。

2012年，在蔡天新的建议下，杭州市地名办和民政局将距老桥遗址百米的一座新桥命名为道古桥。桥头还树了一块石碑，由中科院院士、数学家王元先生题写了桥名。

台湾科学作家江才健认为，“由道古桥与《数书九章》谈到秦九韶的数学贡献，不但洗刷了秦九韶在科学史上的疑难，同时也建立起他应有的历史地位。”

其实，《数书九章》取得的卓越成就足以确立秦九韶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其声名原本就无需借道古桥而立！依稀记得江才健撰写过吴健雄、杨振宁的传记，如果他真说出过上面这样的话，那他的学力和识力都是值得怀疑的，这句话证明他面对蔡天新来历不明的发明缺乏最基本的判断力。一方面，撇开前面

的两处硬伤不说，单是一句“嘉熙年间道古建造”就不可能出现在《咸淳临安志》里，要是潜说友真要记载秦九韶修建了所谓的西溪桥，于情于理他绝无可能特意略去秦九韶的姓“秦”，仅用“道古”来指代秦九韶。再说《咸淳临安志》专门记载了565座桥名，在潜说友眼里，秦九韶根本就不具备进入《咸淳临安志》的资格。另一方面，蔡天新一下就发现了关于“西溪桥”的三则珍稀史料，应该属于非常了不起的行为，就发掘史料而言，可以称得上惊天动地。并且蔡天新发明的掌故实在太完美了，他把临安一座普通的桥与秦九韶、秦九韶的朋友（李心传）、朱世杰等民族先贤紧紧连在一起，这种完美令人不可思议，已经远远超越了历史真实性的范畴。李心传是南宋史学大家，秦九韶和朱世杰都被列入宋元数学四大家，是数学史界重点研究的杰出数学家，钱宝琮撰写经典论文《秦九韶〈数书九章〉研究》时，旁征博引，应该穷尽了现存的古典材料，特别是钱宝琮还在文章里论及秦九韶的道德污点，如果秦九韶修建了道古桥，这是莫大的善事，钱宝琮一定会在论文里专门指出。就掌握史料以及文史修养而言，钱宝琮的渊博精深绝非蔡天新所能想象到的。再有，虽说李心传是成就斐然的历史学家，但他只是一介书生，埋头著述，在仕途上并无显著成就，处理俗务非其所长，即使秦九韶修建西溪桥时向他求助，估计他也不可能提供什么实质性帮助。总的说来，只要对蔡天新的发明加以分析，一个具有职业素养的科学文化工作者就会对这项发明有所警惕。

2021年7月30日《解放日报》在《解放周末·对话》版刊发了其记者专访蔡天新的访谈“数学与艺术，其实没那么遥远”，其中就有如下的答问：

解放周末：据说，您曾“守护”了与秦九韶颇有渊源的“道古桥”？

蔡天新：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上原有一座石桥，叫道古桥。道古是秦九韶的字，据南宋咸淳初年《临安志》，造桥者是秦九韶。后因西溪路扩建改造，原先的桥和溪流成了平地。我在那儿附近住了很多年，后来看到在距道古桥原址约百米处建了一座新桥，我便提议，给这座桥重新命名为“道古桥”，并酌情在桥头设立一块石碑。此建议后来被杭州市政府采纳，我请数学家王元先生题写了桥名。英国剑桥的数学桥，相传由牛顿设计，是游人的必游之地。所以我特别高兴，在历史文化名城杭州，现在也有了一处科学人文景观。

2025年9月21日上午蔡天新在浙江图书馆之江馆二楼报告厅作了一场题为“秦九韶：伟大的数学家和梦想家”的通俗报告，该报告被列于“文澜讲坛”第1338期，其宣传预告写到：

秦九韶（1208年-1268年），字道古，祖籍鲁郡（今河南省范县），出生于普州（今资阳市安岳县），南宋数学家。与李冶、杨辉、朱世杰被誉为“宋元数学四大家”。

秦九韶创立的中国剩余定理是数论教科书的基石，广泛应用于密码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他提出的秦九韶算法在计算数学中高效求解多项式，至今仍是计算机科学的重要工具。此外，秦九韶还与浙江有着深厚渊源，其巨著《数书九章》便是在湖州守孝期间完成的。1238年，秦九韶丁父忧回到杭州，为利民众通行，亲自设计建造了西溪桥，后被命名为“道古桥”，至今仍横跨在西溪河上。

“秦九韶造桥”已经成为蔡天新的标志性成就，不过他的这项成就完全出自他天才的臆想，绝对不是通过缜密的学术考证得来。尽管他总在那些不求真知的局外人面前成竹在胸侃侃而谈，说得天花乱坠，但他从不涉及也不敢涉及三个最根本的问题，更没有提供他本该提供的答案，这对一个获得过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科类）优秀成果奖、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杭州首届10大创新力人物等巨大荣誉的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来说是非同寻常的。这三个问题是：

一、“西溪桥 本府试院东，宋代嘉熙年间道古建造”到底出自哪本咸淳初年《临安志》？

二、“秦九韶通过朋友（李心传）帮忙修建‘西溪桥’”到底出自哪本典籍？

三、“朱世杰为‘西溪桥’改名‘道古桥’”到底出自哪本典籍？

这是三个非常严肃的学术问题，根本不能回避也不该回避。当然，第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如果根基性史料“西溪桥 本府试院东，宋代嘉熙年间道古建造”是凭空伪造的，那后两个问题就更是向壁虚构的伪问题了。

二、“道古桥”考

按照宋史研究的常识，要考究南宋都城临安的掌故事迹，必须从临安三志入手，这是最基本的出发点。所谓临安三志，乃是《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三部志书的统称，见[6]，它们都由时任临安知府主持修纂。尽管留存至今的三部志书都不是完整无缺的，但非常幸运的是，三部《临安志》关于临安桥梁的记载一直保存了下来。本文要从这三部方志开始考证，环环相扣地证明杭州现今命名的“道古桥”之前身就是南宋修建的“道姑桥”，与“西溪桥”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并且“道姑桥”十九是由潜说友在咸淳年间主持修建，与秦九韶完全没有任何关系，这就彻底推翻了蔡天新发明的新奇之说。

《乾道临安志》由南宋周淙在乾道五年（1169年）编纂完成，是现存最早系统记载南宋都城临安的官方志书，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八明确记载：“（乾道）临安志十五卷 府帅吴兴周淙彦广撰”，现残存三卷，其中卷第二分设18个部分记载临安的行政沿革、城府建设以及经济数据。桥梁是当时临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卷专门立有条目“桥梁”，一共记录了73座桥名，当中

根本没有“西溪桥”和“道姑桥”。《乾道临安志》成书时，秦九韶还没有出世，自然地这部志书与本文几乎没有关系。

《淳祐临安志》由南宋施谔在淳祐十二年（1252年）修纂完成，原书卷数不详，今残存五卷至十卷。清代阮元为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淳祐临安志》六卷，云：“此与乾道、咸淳二志，备载南宋数朝掌故，籍补史传之遗，皆未可以残缺废也。”卷第七分坊巷，界分，桥梁，仓场库务，馆驿等5个部分录载临安的城府建设，其“桥梁”记载甚为系统周详（这里略去桥名）：

城内大河（南自都亭驿直至天宗水门。） 共有23座桥；

（城内）小河（自葛公桥入清冷桥，至众安桥、观桥转。） 共有31座桥；

西河（中系清湖。南自旱河头直北至众安桥止。三桥转西入金文桥，至州前断河头止。八字桥转西入清湖桥，直至北关水门止。） 共有46座桥；

城南左厢（城东附） 共有52座桥；

城北右厢（城西附） 共有53座桥，

以上总计共有255座桥，没有“西溪桥”和“道姑桥”，更没有“道古桥”。大约从乾道五年（1169年）至淳祐十二年（1252年），临安增加桥梁182座，于此可见当年南宋都城临安发展之迅猛。

南宋“嘉熙”是宋理宗赵昀在位期间使用的第四个年号，共使用4年，从公元1237年至1240年。按照蔡天新的发明，在嘉熙年间，他的更准确的时间表述是在1238年，秦九韶回临安丁父忧时，眼见河上无桥，两岸人民往来很不便，便亲自设计，再通过朋友（李心传）帮助在西溪河上修建了一座西溪桥。如果这是事实，那这种美事善行当在《淳祐临安志》上就一定会有所反映，毕竟1238年距离1252年不算久远，可是为什么在《淳祐临安志》上就是找不到“西溪桥”呢？答案只有一个：这座桥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这是修撰志书的自然之路。相比《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两部方志，《咸淳临安志》旁搜博采，篇幅远为庞大，保存了极其丰富的史料。《咸淳临安志》考辨精审，记述详备，条理秩然，是研究南宋都城临安的权威史料。也是研究南宋历史的必备典籍，受到历代尊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咸淳临安志》云：“前十五卷为行在所录，记宫禁曹司之事。自十六卷以下，乃为府志。区画明晰，体例井然，可为都城纪载之法。”潜说友序《咸淳临安志》云：“暇日视故府，阅郡乘，或病其漏且舛，乃葺而正之，增而益之。凡为图，为表，为志，总百卷。”该志现存九十五卷，其卷之二十一专门记录疆域之“桥道”，非常详细，府城之内计有（这里略去桥名）：

大河（南自登平坊内石桥起直至天宗水门。） 共有31座桥；

小河（自宗阳桥转西，由钟公桥起至众安桥，转至观桥，又转以北直至淳佑仓前，接余杭水门吊桥止。） 共有32座桥；

西河（自断河头直北至众安桥止。自府治前桥由流福坊水路至惠迁桥止。自

涌金桥入俞家园、镊子桥至白莲花桥止。自八字桥西入清湖桥，至北关余杭水门止。） 共有 54 座桥；

城南左厢 共有 111 座桥；

城北右厢 共有 119 座桥，

府城内总计共有 347 座桥，全然不见“西溪桥”的踪影。在城北右厢的 119 座桥之中，赫然出现了“道姑桥”：

道姑桥 本府试院东。

《咸淳临安志》还点出了道姑桥的大致方位：

在钱塘门外至羊角埂及古塘里。

在记录完 347 座桥之后，《咸淳临安志》写下了如下事实：

右并在余杭门外。

以上诸桥，咸淳四年九月，安抚潜说友奉朝旨修治。乃遣僚相视，撤旧更新者大半，余则随其阙坏。一切整葺，庠者增崇，狭者增辟，舟车往来，始无前日逼仄阻碍之患。工浩事殷，越明年十月告备。是役也，朝廷首拨钱四十六万六千缗有奇。

道姑桥在《淳祐临安志》里没有记载，于情于理修建该桥的时间应该在淳祐十二年（1252 年）至咸淳六年（1270 年）之间，它十有八九是潜说友知临安府时所修。按照秦九韶的生平记载，从淳祐十二年至咸淳六年，他基本上都不在临安，也不可能设计修建什么“西溪桥”。按照《咸淳临安志》对临安府城桥梁的详细记录，直到咸淳六年甚至咸淳九年，临安府内并没有修建一座所谓的“西溪桥”。在临安府城之外，《咸淳临安志》还记录了关于桥梁的大量信息（这里略去桥名）：

钱塘县 记录了 33 座桥；

仁和县 记录了 62 座桥；

余杭县 记录了 10 座桥；

临安县 记录了 36 座桥；

於潜县 记录了 30 座桥；

富阳县 记录了 6 座桥；

新城县 记录了 10 座桥；

盐官县 记录了 21 座桥；

昌化县 记录了 10 座桥，

在这 218 座桥里，仍然不见“西溪桥”。遍检《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完全不见“西溪桥”一词，也完全不见代表秦九韶其人的“道古”二字，蔡天新发明的根基“西溪桥 本府试院东，宋代嘉熙年间道古建造”到底出自哪个版本的《临安志》呢？

蔡天新还发明了朱世杰更改桥名的动人故事，注意到朱世杰卒于 1314 年，这个故事要是真的，那它只能发生在 1314 年之前。

《梦粱录》[7]是专门记述南宋都城临安的又一部基本典籍，笔者已经撰长文“《梦粱录叙》里“甲戌岁”就是元统二年（1334 年）”考证该书成书于元惠宗元统二年（1334 年）。《梦粱录》全书根本不见“道古”二字，其卷之七详细记录了临安府内的诸多桥梁，同样不见“西溪桥”的踪影，该卷之条目“倚郭城北桥道”记载了“道姑桥”：

本州试院前曰大通桥、王家桥。试院东曰道姑桥，试院西曰清水桥。
这个记载与《咸淳临安志》完全一致，证明在 1334 年“道姑桥”之名还没有改动。

赵学敏（约 1719 年-1805 年），钱塘人，清代著名医学家。赵学敏著有《本草纲目拾遗》[8]，它是继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后的集本草大成之作，其序署时“乾隆乙酉八月”，乾隆乙酉年即 1765 年，是书卷七（藤部）之条目“红皮藤”记载：

朱焘斋《任城日钞》：钱塘门外道姑桥下，有红皮藤。
这里“钱塘门外道姑桥”非常契合《咸淳临安志》之记载“道姑桥 本府试院东。在钱塘门外至羊角埂及古塘里”，这种契合揭示了一个客观事实：《本草纲目拾遗》里的道姑桥就是《咸淳临安志》的道姑桥。

《乾隆杭州府志》[9]成书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后世称为善本，其卷六之名即为“桥梁”，专门记载杭州桥梁，非常清晰详细，卷首强调桥梁于杭州之重要，亦指出桥名多沿袭《咸淳临安志》，云：

輿地志多略于桥梁，而杭州湖桥独著于正史，岂不以东南泽国尤重津梁哉。今会城圯碣之名多仍宋咸淳之旧，考古者审测地望，恒于此验兴废焉。通往来以济厉揭，尤在守土者加之意欤。

《乾隆杭州府志》卷六分 49 个部分记载了杭州的 1503 座桥及其相关信息，全然不见“西溪桥”和“道古桥”，更不见秦九韶造桥和朱世杰改名的事迹。在条目“下湖河西北至古塘西溪为桥凡四十一”下明确记载了“道姑桥”的信息，与《咸淳临安志》《梦粱录》完全一致：

试院大通、王家 咸淳志并本府试院前

道姑 咸淳志试院东

清水 咸淳志试院西

西观音 试院后

《咸淳临安志》和《乾隆杭州府志》是两部官修志书，在这两部书里“道姑桥”就是同一座桥。这就是说，到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道姑桥还一直

存在着，直至清嘉庆八年（1803年）。

翻检1990年出版的《杭州市地名志》[10]，是书在第381页明确记载“道古桥”的来历，特意指出道古桥就是宋代的道姑桥：

道古桥 杭大路西侧之西溪路上。长3.4米，宽5.6米，石拱桥。宋称道姑桥。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一：“道姑桥，本府试院东”。清嘉庆八年（1803）九月重建，桥栏板上有重建石刻。

非常遗憾，笔者无缘见到此重建石刻的拓片之类，无法得知石刻的内容。不过考虑到嘉庆八年“道姑桥”重建之时，《乾隆杭州府志》刊刻未久，以及乾隆在嘉庆四年（1799年）才离开人世，在情理上该桥不会改用别名，应该继续沿用“道姑桥”才是。《民国杭州府志》[11]之卷七、卷八整整两卷专门叙录杭州桥梁，其卷七之条目“下湖河西北至古塘西溪各桥”记载：

试院大通、王家 并本府试院前

道姑 试院东

清水 试院西

西观音 试院后

这与《乾隆杭州府志》毫无二致。《民国杭州府志》主体成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民国五年（1916年）续修，上述记载表明“道姑桥”改名“道古桥”应是民国之后的事。综合以上证据链可知，《杭州市地名志》里之道古桥的前身就是《咸淳临安志》里的道姑桥，这座桥与秦九韶没有任何关系。再联系西湖区人民政府在道古桥石碑上所刻碑文，就能明白《杭州市地名志》里的道古桥因西溪路扩建被夷，现在的道古桥建于2005年，它与秦九韶也没有任何关系，至此可以断言蔡天新发明的“秦九韶修造杭州道古桥”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在杭州确实有一座西溪桥，它与秦九韶就更加不可能发生联系了。《杭州市地名志》在第380页明确记载：

留下桥 位于留下街，长12米，宽14米，梁板式公路桥。又名西溪桥，洋桥。1919年建，抗战时毁于兵，光复后修复。1965年、1981年两次改建。

真相已经浮出水面，其实从上面论证来看，只要遵照基本的学术规范行事，要揭开真相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

“西溪桥 本府试院东，宋代嘉熙年间道古建造”完全是蔡天新有意识地炮制出来的弥天大谎：“本府试院东”确实来自《咸淳临安志》，蔡天新刻意使用伪造的“西溪桥”去取代真实的“道姑桥”，这样《咸淳临安志》里的准确记载“道姑桥 本府试院东”就变成了似是而非的“西溪桥 本府试院东”，他伪造出模棱两可的证据，就是要浑水摸鱼。为了加强说服力，他又非常拙劣非常浅薄地凭空添加一句“宋代嘉熙年间道古建造”，这种移花接木的深厚功夫绝对不是

出于他一时的疏忽大意，而是他有意为之。他在长时间里蒙骗世人，博取名利，其做法远远突破了一个学人应该遵守的最起码底线，全然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再来阅读蔡天新那些道貌岸然充满正气的文字，这位造起假来令人瞠目结舌的“江南才子”（笔者注 这里借用张益唐使用的术语，见[4]）以一副十足的教师爷口吻谴责那些在学术上的弄虚作假之徒，把《数学传奇》之“初版序言”写得义正辞严，充满了道德力量：

遗憾的是，在当前中国社会，充斥着各种名目繁多的弄虚作假，包括学术造假，有的甚至触目惊心。但在纯粹数学领域，任何创造性的工作或发现都显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是难以通过人为的手段掩饰或虚构的，这就把那些科学骗子或混混拒之门外。

《数学传奇》之“新版序言”在结尾处引用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话（注 笔者对詹姆斯其人其言没作考证，仅仅借用了蔡天新的术语）：

真理对思想而言无论怎样都是有用的，正如道德对行动而言无论怎样都是有用的。

对比蔡天新的言行，这是多么动人心魄让人无语面对的讽刺啊！透过蔡天新的奇文“秦九韶，道古桥与《数书九章》”之第一节，笔者实在看不出他追求什么真理，也实在看不出他遵守什么学术道德，只能看出他对真理和道德根本没有敬畏之心，他只是一个十足的利欲熏心之徒而已。先贤荀子在《荀子·大略》里的论述又在笔者耳边回响：“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这里提及蔡天新的一件往事是非常合适的。一位华裔数学家读到本文初稿后，专门把蔡天新二十多年前的一次学术不端行为告诉笔者，它能够充分证明蔡天新的学术诚信早就是存在污点的。2002年4月我国《数学学报》（英文版）刊发了一篇文章“On the Residues of Binomial Coefficients and Their Products Modulo Prime Powers” [12]，作者署名为蔡天新（CAI Tian Xin）和美国数学家GRANVILLE Andrew，2003年1月该杂志在所刊文章“A Characterization of Continuous Module Homomorphisms on Random Semi-Normed Modules and Its Applications”最后一页的末尾位置登载了一则极不寻常的更正启事：GRANVILLE 否认他是文章的一名作者。兹移录此更正全文（见[12]）如下：

Erratum: GRANVILLE Andrew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University of Georgia, Athens, GA30602, USA) is not an author of the following paper: On the Residues of Binomial Coefficients and Their Products Modulo Prime Powers, Acta Mathematica Sinica (English Series), 18(2), 277–288 (2002)

美国《数学评论》(MR1910963)在评论论文[12]时,专门添加了一个注记来强调这则更正启事:

Reviewer's remark: Granville was listed as a co-author of this paper without his permission. An erratum to this effect is being published in Acta Math. Sin. (Engl. Ser.) 19 (2003), no. 1.

一位在学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其人生极具传奇色彩、在学界广受尊敬的仁人君子在邮件里评论说:“真是一个令人难堪的更正。”一叶知秋,这句成语真是知人论世之言!

三、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秦九韶造桥”、“朋友(李心传)帮忙”和“朱世杰改名”确实都是非常新奇优美的传说,极易打动常人心弦,被常人认可接受,同时也极易引人迈入歧途。是说甫一问世,就得到了广泛响应,十几年来似乎都没人质疑蔡天新来路不明的神奇史料之真假。幸乎?不幸乎?

2012年金永炎编著出版《西溪的桥》[13],该书是《杭州全书·西溪丛书》中的一本。《杭州全书》由王国平担任总主编,目的是“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杭州的前世今生”,具有强烈的存史意识。[13]完全采信蔡天新之说,其第六章《时空记忆——桥与历史人物》专门列了条目“道古桥与秦九韶”,现在照录该条目如下:

道古桥在杭大路西侧之西溪路上,长8.4米,宽6.5米,石拱桥,宋代嘉熙年间道古建造,原名曰“西溪桥”。元人朱世杰为纪念建桥人道古,更名并书镌“道古桥”。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一:“道古桥,本府试院东。”清嘉庆八年(1803)九月重建,桥栏板上有重建石刻。南宋历史上著名的“临安大火”烧掉临安太庙、三省、六部、御使台等,许多朝廷官员纷纷搬到西溪河畔的临时官邸。相传一位在巴蜀当过州守回临安奉祠的秦姓官员也随之住进这里,大约是绍定年间(1228—1233),他的儿子回临安殿试也在这里住过,当年真还入仕了。但没过几年,这位秦姓官员去世了,他这个在外地做官的儿子也回杭州丁父忧,这期间,他见到西溪河上没有桥,两岸的人来往很不方便,就设计了一座桥,然后找到朝廷一位李姓秘书少监,由朝廷资助了银两,他负责建造了一座桥,名曰“西溪桥”。秦九韶(1208—1268),字道古,四川普州(今安岳)人,嘉定元年(1208)春诞生在普州,绍定二年(1229)十月,秦九韶擢郫县县尉,绍定四年(1231)八月,秦九韶参与魏了翁平抑泸州蛮夷,葺其城楼榭雉堞,绍定五年(1232)八月己丑进士,绍定六年,秦九韶在魏了翁带领吴潜等督视潼川府路、成都府路时

认识吴潜，魏了翁和吴潜同秦九韶去拜望病中的许奕。端平三年（1236）一月，秦九韶擢升湖北蕲州（今湖北蕲春县）通判。嘉熙元年（1237）年秋，秦九韶知和州（今安徽和县）。秦九韶在数学上的主要成就是系统地总结和发展了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和一次同余组解法，提出了相当完备的“正负开方术”和“大衍求一术”，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秦九韶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一套完整的利用随乘随加逐步求出高次方程正根的程序，亦称“正负开方术”，现称秦九韶法。

为了加强文化建设，杭州市专门成立了“杭州全书编纂指导委员会”、“杭州全书编辑委员会”，《杭州全书》是要为后代留存“信史”的！但在对待道古桥的事情上，《西溪的桥》明显违背了编纂出版《杭州全书》的初衷。

2018年11月26日杭州网挂出一篇题为“秦九韶、道古桥与《数书九章》”的文章，积极附和蔡天新的发明：

杭州西溪路上曾经有一座老桥，叫道古桥。始建于南宋嘉熙年间（1237-1241），初名西溪桥。南宋咸淳初年《临安志》有载：“‘西溪桥’，本府试院东，宋代嘉熙年间道古建造。”这个造桥的“道古”不是别人，正是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道古是他的字。

杭州在南宋时升格为临安府，是南宋都城，现在号称历史文化名城，竟然没人发现“南宋咸淳初年《临安志》”之非？没人发现“西溪桥 本府试院东，宋代嘉熙年间道古建造”里“宋代”一词之违反常识？

2017年杨国选出版《秦九韶生平考》[14]，其中《宋元数学两大家与临安道古桥》一节在继承蔡天新发明之外，还对蔡天新的发明有所扩展：

几经周折，笔者从浙江省图书馆、浙江省档案馆、杭州市市志办、杭州市地名办等部门查到“道古桥”的相关资料。

《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一：“西溪桥，本府试院东。”元《大德临安志》卷一十五：“道古桥，本府试院东，西溪河之上。”宋嘉熙年间“道古”所建，名曰“西溪桥”。元人朱世杰为纪念建桥人“道古”，将“西溪桥”更名“道古桥”，并书镌桥头。清《嘉庆临安志》卷二十载，嘉庆戊寅（1818）九月重建，桥栏板上有重建题刻。

杨国选还用3个脚注证明上面的资料来源。

脚注1 潜说友撰：《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一。按：《咸淳临安志》，一百卷。咸淳五年（1269），潜说友在周淙撰《临安志》十五卷的基础上，续撰后八十五卷。

这个脚注暴露出杨国选与蔡天新一样，对《咸淳临安志》缺少最基本了解。

他们根本不知道：要了解南宋都城临安的桥梁掌故，必须从临安三志入手。

脚注 2 元大德七年（1306），刻《临安志》卷十五。

这个脚注是为了证实朱世杰确实把“西溪桥”改名为“道古桥”。本文前面的证据完全能够证明：即使该《临安志》是真实存在的，也不可能记载蔡天新发明的“道古桥”之事迹。

脚注 3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刻《咸淳临安志》卷二十；《杭州市志》，中华书局，1995；杭州市地名委员会编，《杭州市地名志》，中册，第 381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年。

查阅《杭州市地名志》，只要在“西溪诸桥”下查找到“留下桥”和“道古桥”两条，再按图索骥，即可发现蔡天新之非。笔者实在想不明白：在见到《杭州市地名志》里这么明显的线索后，杨国选为什么没有去进行严格的考证？！

《高等数学研究》在 2023 年第 1 期发表了胡吉振等 5 人合作的文章“数学史视角下的课程思政教学案例研究——以《初等数论》的‘中国剩余定理’为例”，文章自然而然地引用了蔡天新发明的道古桥典故：

秦九韶在浙江省曾留下一处古迹，现在成为一处旅游景点。大家应该能猜到吧？因为南宋当时在临安建都，也就是今天的杭州。秦九韶在杭州期间，设计了一座桥。他去世后约五十年，另一位数学家朱世杰（1249 年-1314 年）为了纪念秦九韶，根据秦九韶字“道古”，把他设计的这座桥命名为“道古桥”。

这篇文章的 5 位作者凭空相信完全不靠谱的二手材料，不去核实秦九韶造桥之说的真假，这在学理上是不严谨的。

无独有偶，2023 年 5 月 18 日华东师范大学顾方在其导师刘攀副教授指导下，撰写并提交了硕士学位论文《秦九韶数学思想研究及其话剧创作探索》，论文的立论依据之一是“秦九韶还有一个世人熟知的功绩就是——道古桥”，试图通过秦九韶造桥来“表现秦九韶为国为民、默默付出不求名的精神”。顾方还在文中表示“在接下来的日子中，我将把修改剧本作为自己的长久的任务”。让人惊奇的是，他竟然在参考文献里没有列入蔡天新的任何作品，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找到秦九韶造桥这个传说的根据的。反过来说，此事明白无误地反映出蔡天新发明的故事流传之广，已经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经典掌故的行列。这真是学术的悲哀！

这些著作和学术论文的作者缺乏文史常识，面对二手材料没有判断力，又不能按照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去核查文献，都昏昏然地以讹传讹。至于普通作者就更不能明辨是非了，比如 2014 年 1 月 6 日《书屋》就发表了蔡圣昌的文章“秦九韶的是与非”，文中写道：

1238 年，他到杭州为父亲守丧，发现西溪上面没有一座桥，百姓出行很不便，就自行设计造了一座桥。后来此桥以他的名字更名“道古桥”。

在百度上搜索“秦九韶”，该词条记载了秦九韶的造桥事迹：

嘉熙二年（1238），秦九韶回临安丁父忧，秦九韶在杭州丁父忧期间，发现西溪两岸的群众过河很不方便，在西溪上设计修建一座桥，名“西溪桥”，数学家朱世杰为纪念秦九韶，将桥命名为“道古桥”。

在百度上搜索“道古桥”，就会出现如下结果：

道古桥是位于杭州西溪路的历史桥梁，始建于南宋嘉熙年间（1237-1241），初名西溪桥，由数学家秦九韶设计，元代数学家朱世杰命名。秦九韶所著《数书九章》包含中国剩余定理等数学成就，原桥具科学文化价值。原桥因西溪路扩建被拆除，仅留同名公交车站距原址约百米。2005年于附近重建新桥，桥名由数学家王元院士题写，延续历史文脉。重建后的道古桥成为展示宋代数学与科技成就的文化地标。

十几年来，各种附庸风雅之徒乘势而起，借助“道古桥”写些无关痛痒的文字之类，不胜枚举。在这股潮流之外，郭书春[1]之第一章介绍秦九韶的生平，最后部分写道：

南宋临安有一座道姑桥，在今杭州市杭大路两侧之西溪河上。此桥长8.4米，宽6.5米，为石拱桥。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一云：“道姑桥，本府试院东。”此桥又称为“道古桥”，与秦九韶的字相同。西溪河在21世纪因城建而改道。2012年4月27日，西湖区人民政府在改道的西溪河上重建道古桥，并请著名数学家、中国数学会原会长王元院士题写了“道古桥”，以纪念数学家秦九韶。

这段文字非常规矩而又精准地给出了“道姑桥，本府试院东”及其准确出处“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一”，这与蔡天新的做派具有云泥之别。非常可惜，郭书春未能更进一步，没有对“道姑桥”与“道古桥”的关系做出有效考证，只是草草地以“此桥又称为‘道古桥’，与秦九韶的字相同”收场。惜哉！从历史角度来看，作为数学史家的郭书春在书中使用“原会长”一词似乎不甚严谨，还是改为“原理事长”更为合适。非常可能，郭书春已经意识到蔡天新的材料来源是不靠谱的！

也许当年蔡天新漫步杭州街头经过道古桥时，突然联想起秦九韶的字就是“道古”，他可能为自己的这个发现激动不已，经过反复的权衡推演，在邪恶之心的驱使下又一次寻了短见，有目的有步骤地篡改史实伪造史实，强行把道古桥与秦九韶和朱世杰进行了捆绑，没有料到竟由此暴得大名，其邪门之说竟轻而易举地流播四方，甚至波及域外。还是那位在学界广受尊敬的仁人君子在邮件里对笔者说：“蔡天新能到今日，环境没有及时纠偏也是有责任的。”这真是充满悲悯的菩萨心肠，善哉善哉！的确，要是学界能够早早地遏制住蔡天新，他或许不能在邪路上走得如此之远，也不能对社会造成如此之大的伤害！但他如此苦心钻

营，如此处心积虑地造假，确实令人防不胜防。常言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历史总要逐步地还原出事实真相，他的无耻行径迟早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行文至此，联想到当今学术造假者一再出现，有时甚至大行其道，严重毒害了学术风气，不少造假者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按照笔者非常有限的见识，像蔡天新这样造假这样误人的现象在数学界是前所未有的，是值得社会学家进行深入解剖的。

作者感谢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郭康松教授、杜朝晖教授的慷慨帮助！

参考文献

- [1] 郭书春，秦九韶传，成都：天地出版社，2024.
- [2] 徐雯雯、俞宁，跨越前年的数学桥，数学文化，4:3（2013），79-84.
- [3] Xu Wenwen and Yu Ning, Bridge Named After the Mathematician Who Discovered the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Notices of AMS., 60:5(2013), 596-597.
- [4] 蔡天新，数学传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5]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2012.
- [6] 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3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
- [7] 吴自牧，梦粱录（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 [8] （清）赵学敏著，侯如艳校注，本草纲目拾遗，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0.
- [9] （清）郑沅修，邵晋涵纂，（乾隆）临安府志（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701-70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0] 杭州市地名委员会编，杭州市地名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 [11] 《中国地方志集成》编辑工作委员会，民国杭州府志（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1-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
- [12] CAI Tian Xin, GRANVILLE Andrew, On the Residues of Binomial Coefficients and Their Products Modulo Prime Powers, Acta Math. Sin.(New Series), 18:2(2002), 277-288.
Erratum, Acta Math.Sin.(New Series), 19:1(2003), 208.
- [13] 金永炎编著，西溪的桥，杭州：杭州出版社，2012.
- [14] 杨国选，秦九韶生平考，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